

## 一九二七年“海宁无产阶级大游行”纪实

(詹秉文)

关于一九二七年“海宁县无产阶级大游行”这件事(以下简称“大游行”),有必要先在此说几句开头话,作为这件事的引子和简单的轮廓。

由于我在当时也是一个亲身参加和经历过的人,时至今日,相距已久,有些情况难免有遗忘或模糊之处,但对那些重要的事实,却还是记忆犹新,比较清楚的。

这次“大游行”是国民党县党部全体执监委共同商议决定并领导进行的(按:当时海宁县党部系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劳资纠纷问题(具体情况详后),虽经县党部派人作了多次调解,但由于资方态度蛮横,气焰嚣张,因此,当时县党部决定举行一次全县性的“无产阶级大游行”的示威运动,并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举行。

可是,在这次“大游行”如期举行以后不久,省方派了很多武装警察,大肆搜捕那些发动和参加“大游行”的领导人及家属。这次“大游行”虽受镇压,但意义深远,是海宁县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 “大游行”产生的主要原因

当时,海宁县党部在工人运动中成立了海宁炭业工会。不久,炭业工会代表根据炭工群众的要求,以工资太低,生活难以维持,要求资方酌量增加工资。这本属情理之常,也是不难解决的。可是炭业的资方却坚决拒绝,因而发生了劳资纠纷问题,经县党部派人多次调解无效。根据海宁炭业工会的主任委员吕洪甸、副主任委员

李耀坤的申请，县党部召集劳资双方代表开会协商，原期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给予调解，不料双方始则互相争辩，继而互相争吵，后来愈吵愈烈。炭业资方的一个代表发言，甚至声势汹汹，蛮不讲理，虽经县党部同志加以规劝，亦置之不听，另一个资方代表站起来，竟然高声厉色地说：“我奉劝你们炭工们，还是识相一点好，你们如果嫌工资低，尽可把自己的行李挑回家去，我们决不挽留。”这些话立刻激起在场旁听的炭工群众的无比愤怒，一时人声鼎沸，沉不住气的工人，喊出了“打倒资本家！”“打倒资本家的走狗”的呼声，不少人也应声高喊，还有人冲到那个炭业资方的代表身边向他质问。当时，由于双方各不相让，相互发生了殴斗，虽经县党部好几位同志竭力排解劝导，一下子还是安静不下来。此时，县党部负责同志立即上台喝令双方严守秩序和纪律，会场才平息下来，随即由县党部宣布散会，并告知双方听候安排和处理。

#### 县党部召开紧急会议

上述情况发生以后，县党部的同志一致认为：对这样的事件，如果不很好给予解决，不但会使今后工作上增多困难，而且对于那种带有普遍性的劳资纠纷问题，也必将产生不好的影响，其他各业的资方，甚至很可能会起而效尤。但究竟应采取何种方式较适当而又有威力呢？根据多数同志意见，决定当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共同商讨。

当晚按时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执委姜冰心、苏情安、詹秉文、周商（按以上四人当时均为中共党员）、张貽乘，监委沈镜轩（朱尚、季碧霞两人请假），以及秘书羊仰高（当时为中共党员）、周学文。列席者有居天籁（当时他是中共硃石支部书记，并任县党部工农特派员，是这次“大游行”的实际领导人）。会上，各同志

充分发表意见。姜冰心首先发言，他主张：必须紧紧抓住这次的典型事例，来公开而广泛地开展一次大规模而又非常深刻的阶级教育运动。居天籛同志立刻表示赞成：“姜冰心同志这一主张，很有见地，既有深刻的阶级教育意义，又有巨大的威力，确实很好！”接着，苏情安、詹秉文两人也同声表示说：这个意见，确实好极，既适当，又及时，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始终坚定地站在扶助工农群众一边。至于这次运动的方式，我们认为可以采取“大游行”的方式，工农群众都属于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干脆就称它为：“海宁县无产阶级大游行”。与会同志都一致赞成，并立即决定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准时举行。

关于“大游行”时要准备的各项细节，经会上详加商讨，作出决定如下：

1、“大游行”的会场，决定在庙官前的广场上。会场台上悬挂大横幅，上写：“海宁县无产阶级大游行会场”。两旁分贴对联式的标语各一条，左边写“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右边写“向一切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恶势力决斗”。

2、“大游行”时的队伍，为了便于维持秩序和领呼口号，决定为七个小队，每小队各推定一位负责人。当由会场上推定是詹秉文、苏情安、姜冰心、周燮商、羊仰高、张貽乘、周学文担任，并决定对每个小组的负责人发给红色臂章和手执小红旗，以资识别。

3、“大游行”时所呼的口号和各处张贴的标语，其内容词句完全一致，一作两用。当经会议决定如下：

(一)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二)向一切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恶势力决斗！(三)打倒帝国主义！(四)打倒资本家！(五)打倒资本家走狗！(六)打倒土豪劣绅！(七)打倒张信甫（海宁实业资方的总头目）！(八)无产阶级

胜利万岁！

4、在大游行队伍出发前集中开会时，推定姜冰心负责宣布这次“大游行”的重要意义。在“大游行”完成后开会结束时的讲话推定苏情安、周燮商两人负责，时间均以三分钟为限。关于“大游行”时队伍次序安排和领队名单，推定由詹秉文宣布。

5、关于通知本埠城区（即第一区）和外埠各区（包括二区硃石、三区袁花、四区长安、许村，五区斜桥、周王庙）各业的工会（计：炭业、油车业、泥木业、装卸业、运输业……等）和各业的同业公会（计：米业、肉业、鱼业、酒酱业、绸布业、百货业、饮食业、南货业、药材业……等）推派代表必须在三月二十三日前提到，参加“大游行”。推定由苏情安、詹秉文、周燮商三人负责，分头通知。

6、关于“大游行”的路线决定如下：由庙官出发，经县府门前往南直街，过富家桥折向北大街，穿北城门到平安桥，然后折返居家弄，经窰家湾，沿城河塘至小东门街尾，折向过教场，到大东门，仍回庙官会场原地集合，等候大会宣布结束散会。

7、“大游行”会场上组织临时纠察队（十二人），推定詹秉文从海宁炭业工会中组建。

8、关于标语的写制，推定周学文负责办理。需要两种：一种是发给各小队收执。张贴的须在二十四日早上在城厢内外张贴齐全。

#### “大游行”时的现场概况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这天，正值天朗气清，阳光灿烂。“大游行”的会场上气势庄严，到会的人个个情绪高涨。上午八时左右从各地赶来参加“大游行”的各业工会和同业公会的代表，纷纷向大会签名报到。截至九时左右，各区代表都已陆续到齐，随即由县

党部的姜冰心同志到台上宣布大会开始，向全场代表讲话，扼要的说明了这次举行“大游行”的重要意义（当时全场代表鼓掌）。接着，詹秉文向全场宣布“大游行”的列队次序，领队名单以及游行纪律。游行出发之际。会场四周鞭炮爆声响彻云霄，同时鼓号齐鸣。

当那浩浩荡荡的“大游行”队伍沿着规定路线前进，蜿蜒曲折，偃若长龙，气势极为雄壮。路旁有不少观众说：“这样雄壮的队伍，阿拉从来没有见过”。特别是各小队接连不断地高呼口号，精神抖擞，响声震耳，使当时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吓得胆战心惊，销声匿迹。

游行队伍按照预定的路线游行完毕后，回到庙官会场集合。当即由县党部的苏情安同志（按：当时任中共海宁小组书记）到台上向参加这次“大游行”的全体代表举手致敬，随即高声地说：“各位代表们！我们大家来拍手，热烈祝贺这次大游行的胜利完成”。当时全场立即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周燮同同志对全体代表讲话，大意是：希望各位代表回去后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能团结奋斗，为农工商的群众运动作出更好的成绩，不要怕那些压迫和剥削我们的恶势力。我们大家只要团结起来，就有无穷的力量，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他讲话后全场又响起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此时，詹秉文领着全场代表高呼口号，会场四周，又响起了长时间的爆竹声、鼓号声。大会在这样一片斗志昂扬的气氛中散会。

#### “大游行”后省派武装宪警搜捕镇压

“大游行”后不久，省方派了大批宪警，满载一卡车，个个荷枪实弹，赶来海宁。据当时目击者告：卡车到达后，全部宪警立刻包围县党部，大肆搜捕，但一无所获。因此，又各分散赶往各个同志家中抓人。当时被捕的有：居天福、周燮同、羊仰高、周学文、陈

飞。另外还有詹秉文的妻子黄梦杏，连同襁褓的一个女儿也未能幸免。当天下午就全部押送到杭州，关入陆军监狱。当时还留下了十多名宪警，继续往各处侦查搜捕达一星期之久。据当时旁观者告知这些宪警到各人的住宅去搜捕时，如此熟门熟路，肯定有地方上的某些坏蛋在密报名单和提供各人的住址。

事后一个月，事实真相才逐步暴露：反对这次“大游行”，并在暗中进行阴谋陷害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炭业资方的总头目张信甫，他伙同走狗连夜赶往周王庙，去向那个海宁著名的大土豪兼帮会头子许行彬告急求援。据说，当时张信甫曾向许说：“不得了，海宁城里近来发现不少“赤化分子”在地方上破坏捣乱。如果不赶快把它根除，势必后患无穷。”那许行彬一听到什么“赤化分子”本来就非常敌视和仇恨，更何况同张信甫历来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是互相勾结、串通一起的。因此，许就急向省有关当局告密，制造这场事变。这完全是当时地方上那些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特别是当时的局势，正是国民党的新老右派互相勾结，大刮其所谓“整理党务”的逆风，加紧酝酿“四·一二”的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因而使海宁的反动势力能乘机进行阴谋陷害。

#### 被捕和避离人员的情况

在被捕者中，最早释放的是詹秉文的妻子黄梦杏，她在狱中只有一个半月左右。其次是羊仰高、释放也较早，在狱中约五个月左右。值得提及的是：羊仰高在狱中曾写有两首诗寄给他的妻子黄月华。题目是《狱中寄内》。这两首诗，他在释放后曾抄寄给我。现在附录于此，其一云：

平地风波起突然，铁窗风味饱尝来；雪冤终有天明日，寄语吾妻尽乐观。

其二云：

痛苦不妨听自然，“南无”何必念如来。跳梁小丑终须灭，  
祝愿吾妻放眼观。

不久，周燮商、周学文、陈飞三人也相继被释。他们在狱中都已半年以上了。其中居天籁在狱中最久，达一年以上，而且还受到多次酷刑。我们得知后，无不潸然泪下。

在避离的同志中，姜冰心先生藏身于硖石附近的乡间，不久即离开海宁去北京，从此没有返回家乡。苏情安初在郭店乡下，后住在黄湾农村。詹秉文避于沪上，典卖房屋财产生活，苦度达一年之久。直到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因家乡的风声逐渐平静了，才得安然返家。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解放前海宁的地方报纸

海宁最早的地方报纸，现在有据可查的是《海宁日报》。它创刊于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地点在当时的县城（今盐官镇），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停刊。现在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张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海宁日报》。

其次，创办时间比较早，出版时间也比较长的是《海宁民报》。现在能看到的，有一张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二日的报纸，报号是一四四号。根据这一日期的报号推算，应该是在这年（一九三〇年）五月份创刊的。《海宁民报》在抗日战争发生后曾一度停刊。其后随抗日武装力量进入县境，曾断断续续出版过几次：最初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在丰士一带出版油印版，每期刊数十份，出版至当年十二月底，八开油印。一九四〇年曾在濮桥出版，但未能坚持。一九四一年又出版过一段时间，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

始正式复刊。最初为油印三日刊，七月中改 版石印，次年（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改为日刊，由国民党县党部管辖。同年抗战胜利，八月二十五日起在硖石出版（原在农村，迁移不定），十月一日起改为铅印，日出四开一张，五号字体，四个版面。以后国民党海宁县委另行创办机关报——《海宁导报》，《海宁民报》就成了国民党海宁县委政府的机关报了。

抗战前，在海宁县城（盐官镇）出版的报纸还有《新海宁报》，当时发行面也比较广，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实物留存了。

硖石由于交通便捷，工商业又发达，人口占全县乡镇之首，是海宁地方报纸出版种类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以前这段时间，可以称得上是地方报纸的鼎盛时期。据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版的《浙江省政务情况》记载，当时就有《硖石报》和《硖石晨报》两种报纸领有内政部颁发的登记证。此外还有一份《硖石民报》出版较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内政部下令要追缴注销它的登记证。

另据解放前《海宁民报》上的一篇文章记载，抗日战争以前，在硖石出版过的报纸还有《硖报》、《大峡报》、《硖石时报》、《硖石商报》、《硖石夜报》等好几种。其中发行量较大、“资格”较老的是《硖石商报》，至今海宁档案馆还保藏一张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七日的报纸，已经出版到第一八一三号上。上面并记载着“硖石中宁巷艺新印刷所印。另售铜元三枚，每月大洋三角。定阅与南大街双山派报社接洽”等字样。按照出版的期号推算，它的创刊时间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比《海宁民报》还早。《硖石商报》曾经办过几个很有特色的专栏，如《抗敌》、《女声》等，参与其事的有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宋云彬和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吴曼华（吴梅）等人。据有关资料记载，《硖石商报》原系

四开四版，还曾刊出对开四版。这些报纸大多以四号字排印。在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首先以五号铅字排印的是《海宁日报》。在内容上，除了一般的新闻报道和商情、广告之外，也有妇女、儿童、医药卫生之类的副刊，定期出版。

抗战期间，国土大片沦陷，在海宁境内，除了《海宁民报》之外，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在海宁路仲镇郊至桐乡县屠甸附近硖石的爱国青年吴曼华、陆欣夫、李国庆、姚逸凡等还创办了一份宣传抗日的铅印小报《甯报》，即后来的《浙西导报》，极大地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最多时日销八百多份。据有的同志回忆，在那一年（一九三八年）年初，硖石沦陷不久，李国庆、徐成等几名爱国青年（有的原为印刷工人），在硖石附近曾出版过抗日小报《生报》，十六开二版铅印，有时一天一期，有时隔两三天一期，收费一分或免费赠送，都是通过来往于各乡镇间的快船，在沦陷区广为散发的。另外，在日伪“清乡”期间，据说海宁一带也有过一些油印小报，宣传抗日救国，可惜这些报纸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也许是由于它们印数太少期数不多的缘故。

日寇侵占海宁期间，也曾利用报纸作为它的舆论工具。硖石沦陷不久，一些汉奸就筹办了一张《海宁更生日报》，宣传奴化思想但为时不久，至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报社就被爱国抗日人员纵火烧毁。以后又改出《海宁新报》，还是“换汤不换药”，为日寇和汪伪所操纵。直到抗战胜利，这才和它的主子一起完蛋。现在，全国有几家大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少数几张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的伪报纸。

抗战胜利以后，除了原有的《海宁民报》自农村迁至硖石之外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又创办了《海宁导报》，初为半月刊，四开

四版，至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改为日刊四开四版。《海宁导报》和《海宁民报》一样，都是国民党政府官办的报纸，以报道地方新闻为主，也有国际国内要闻、行情、广告和综合性的副刊。有时也出一些文艺性的专刊和画刊。在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海宁民报》和《海宁导报》两报合并出版“联合版”，版面缩小一半，每天只出八开二版，在内容上也已毫无特色。仅仅维持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解放前出版的专业报纸，据了解，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还有国民党操纵的县“总工会”办的《工报》，八开铅印，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另外，抗日战争以前还有一份《硖石医药报》，署名是“海宁硖石孙氏医室”孙连茹编的，是定期出版的（一说为日刊），现在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日出版的一张。一九四七年，还有一份《中医导报》，第六期起改冯鹤龄发行。

由于种种原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解放前（特别是抗日战争前）的海宁地方报纸，保存到现在的已经是凤毛麟角，极为少见了。许多报纸今天我们尚未见过实物，有些报纸也可能连它的名称也都湮没无闻了。希望一切关心地方文史资料的知情读者能向我们反映提供更多、更完整翔实的情况和提供实物资料。（陈伯良）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解放后海宁的地方报纸

1955年7月1日，本县创办了《海宁报》，时为铅印八开二版五日刊，系中共海宁县委机关报。1956年3月1日缩短刊期，改为三日刊。1957年7月1日扩大版面为四开四版，刊期不变。1958年4月1日改为四开日刊，更名《海宁日报》。同



《海宁导报》1948年10月。

上海图书馆：

《海宁民报》1934年11月26日、27日。1944年4月4日、7日（注：4月4日是复刊的第一期）1945年7月14日、15日、17日、22日至24日。

1946年1月16日、19至26日、28至29日，2月。

1947年1月至8月。1948年8月7日。

《硖石医药报》1930年4月20日。

北京图书馆：

《海宁民报》1946年4月至12月。1947年1月至12月。1948年1月至7月11日。

《海宁导报》1948年5月至12月。（注：1948年5月1日创刊）

《海宁新报》1942年4月11日；1943年1月至3月10月至12月；1944年1月。

海宁县档案馆：

《海宁民报》、《海宁导报》抗战胜利后的大部分。抗战前的《海宁民报》、《硖石商报》及沦陷时《海宁新报》及解放前《海宁民报、海宁导报、联合版》的零星散张。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北伐时期硖石见闻

1927年2月8日（民国十六年农历正月初七），北伐军抵硖石的前几天，军阀孙传芳部下的溃兵蜂拥而至，到处奸淫掳掠，较为殷实的店家，都遭抢劫。当时我父亲沈华芳在硖石南关厢开设

永顺恒米行，见此情景，只得关起店门，用几十袋米将排门顶住，全家从后门出走，逃到塘桥离塘路约数百米的农家中暂时躲避。

其时正逢天雨，只见塘路上三三两两孙部败兵还不断走向街市，因为街道在望，乡村小路泥泞难行，这些败兵都拥向市镇，所以我们住处得以免受骚扰。硃石镇消防队长吴甲荣原来同袜厂老板蔡征祥在硃石镇商会一道应付溃军，为了想使地方上少受损失，临时向商界筹募来一批银元，给主动找上门来的败兵酌量发给“开拔费”（即给些川旅费打发他们快些离境），可是溃军来了一批又一批，千百元银元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眼见银元将尽，无法打发，吴甲荣只好先行溜走，当时他还记挂蔡征祥能否脱身，实际蔡征祥乘机捞了一票逃之夭夭。据说以后上海沦陷时蔡曾任日伪区长，抗战胜利时伏法。

当夜硃石镇上不时响起枪声，到次日午后，枪声逐渐平息，就有人相互传告：败兵已经全部逃走，北伐军即将开到，通知大家用火油箱放爆竹百响恐吓败兵，迎接北伐军。当时我才十四岁，跟随叔父至火车站看北伐军，路过沙四浜，只见一个脚穿钉鞋的老年妇女倒卧在血泊中，已被孙传芳部的败兵打死，西山靠铁路边，人山人海，有人看见铁路上有三五个背枪的大兵，认为是“党军”来了就欢呼鼓掌，冷不防突然响起枪声，原来这几个还是败兵，一名裁缝师傅大腿上已中了一枪，当别人看到他流血不止，告诉他时，他一看当场昏倒，急送生生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不久兵车抵站，全副武装的党军真的来了，抓住败兵，在火车站审问，征求群众意见，怎么办？群众怒喊枪毙他！当时枪响，大快人心。人们看到北伐军的个子不如孙传芳部下的败兵高大，装备也不如孙传芳部的好。可是孙传芳的部队一碰到党军，却不战而溃。

北伐军到达的第二天晚上，硖石全镇各单位举行了盛大游行，庆祝大革命北伐的胜利。米业、小学的同学，有的敲锣打鼓，有的在街头发表演说，也一齐出动，参加庆祝游行。

不久，干河街徐申如的住房，就作为当时全镇革命人士的活动场所。（沈松年）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抗战初期的海宁“抗敌后援会”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我国军民奋起抵抗。为了积极支援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爱国将士，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以实际行动团结对敌。八月五日，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在杭州正式成立。

“八·一三”淞沪事变后，抗敌后援会海宁分会亦接着成立。主任委员为顾达一（当时原县长黄曝寰即将离任，新任县长王翦波尚未到职），城区（盐官）和硖石、袁花等地都设立办事处，盐官的负责人为王敬五（私立有怀中、小学的创办人和校长），当时继任唐镜甫担任盐官镇长，他积极主张抗日。硖石的负责人李鸿祥，当时是镇商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袁花的负责人是黄克明（又名黄宗亮也是商会会长。抗日后援会的成立，在动员各界人士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的行列中来这一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敌后援会海宁分会下设宣传、总务、救护、通讯、保卫等组。宣传组长公推著名的海宁籍学者宋云彬担任。他曾任《黄埔日报》、《浙江民报》等报编辑，后任开明书店的编辑，“八·一三”后刚刚回到故乡，居住在硖石水月亭，就请他主编抗敌后援会海宁分会

的会刊《抗敌》（作为《硖石商报》的附刊），可惜由于抗战形势急转而下，这份刊物仅仅出版了两个月左右就停刊了。在当时抗日形势的鼓舞下，各阶层的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行动起来。九月十八日这天，海宁县立中学的全体师生自动节食一天，以节余的膳费捐送抗敌后援会汇寄绥远前线，支援抗日。

硖石办事处主干河街戏院举行成立大会。参加者有国民党党政机关的公职人员、教师、医师等和工商界人士，还有自外地读书回来的大、中学生。当时以吴曼华、史惜华、陈才庸为代表的硖石青年都投入了爱国救亡活动。他们和民众教育馆的同志一起，组织救亡歌咏队，抗日宣传队，举行时事讲座、图片展览，并应褚学潜、米谷的邀请，到斜桥等地巡回演出，集体参加了抗敌后援会。通讯组的同志利用无线电收音机（当时还没有普遍使用），收听传布各地的抗日消息。同时，还为前线将士劝募捐款和寒衣、药品。救护组举办训练班和组织救护队。他们聘请了几位医生来教授有关救护（如何消毒、止血、包扎等）方面的简易医药卫生知识，仅仅学习了一个星期，就实地参加了救护伤员的工作，包括被敌机炸伤和从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仅是硖石救护站就购买了好几千元药品。这些药品的钱都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动捐献募集来的。与此同时，抗敌后援会还要日夜不息地协助解决过境部队的供给问题。

在袁花的抗敌后援会办事处，当时也曾建立过医务工作团，派一名医师为代理团长，负责培训医护人员，还请了一位医务工作者来授课。县抗敌后援会主任顾达一到袁花视察时，曾要这里派几名护士到后方医院去护理伤员。

抗敌后援会建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取得的成绩和所起的影响作用都是不小的。当时海宁曾经募集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抗日捐款和

大量物资。为了使许多急救药品和棉衣等物资不致落入敌人手中，硖石的一些爱国青年吴曼华、陈才庸、史惜华、张纪斐、周俊娥等，当战火已迫在眉睫，家乡即将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的紧急关头，还冒着生命危险，漏夜雇船抢运到杭州，将它完好无缺地交给了省抗敌后援会。

（综合张纪斐、李鸿祥、潘家祉、邬克俊、沈松年等人所提供的材料）